读史札记

《光绪朝朱批奏折》二奏片误编校雠

卢　经

《清史研究》1999年第4期刊载陈维新先生“关于《光绪朝朱批奏折》二奏片的疑问”一文，作者因对中俄关系史实比较熟悉，敏锐地发现了第111辑第437、477号二奏片的具奏人和奏报时间的错误，他利用已出版的档案文献《清季外交史料》、《光绪朝筹办夷务始末记》相对照，推测出二奏片的具奏人和奏片朱批日期。作为一个档案编纂的工作者，笔者有责任和义务，利用现有条件，对上述问题作一个清楚的交待。

一、奏片误考

笔者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以下称本馆）所藏清代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录副奏折等档案相互核对，证明二奏片确系误考误编。现将奏片之一第111辑第437号文件及同日、同具奏人，内容相关文件，据随手登记档摘要如下：

（光绪十五年）十月十七日朱批祥麟车多尔济折　九月二十七日发①：

（1）折　派员履勘唐努乌梁海界址情形由（朱批）该衙门知道。

（2）单　俄人挖金种地盖房三事（朱批）览。

（3）片　乌梁海边界请总署照会俄使仍守旧约等由（朱批）该衙门知道。

（4）片　沙滨岭至恰克图边界拟明春持图往勘由（朱批）该衙门知道。

（5）折　新授何贝王林多尔济患病给假二个月调理等由（朱批）著照所请该衙门知道。

（6）片　收到报匣等项目日期由（朱批）知道了。

（7）折　满营换防戍守官兵到防日期（朱批）该部知道。

以上文件摘要中的文件（3）正是《光绪朝朱批奏折》（以下简称《光朱》）误考为“光绪七年二至四月，署理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片”②的437号文件。为稳妥起见，笔者又将与此内容相同的军机处录副奏折核对，证明文件（3）为“光绪十五年九月二十七日，乌里雅苏台参赞大臣祥麟等具奏，十月十七日奉朱批”。另外笔者还发现，与此情况相同的还有文件（4）为《光朱》第111辑，第482号文件，亦被错考为“光绪十年八月至九月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等片”③，陈维新先生并未发现。而文件（1），《光朱》未收录，原件（朱批奏折）现存本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中俄关系项中，《清季外交史料》第八十一卷中“乌苏里雅台办事大臣祥麟等奏派员履勘唐努乌梁海中俄界址请饬商俄使令背约俄人迁回折”④，即是据此件档案的副本抄录的，经笔者与原件相核对，虽然其中有些错字和省略部份，但内容是完整的，而作为此折的附单，即文件（2），是当时事件的详细情况，《清季外交史料》、《光朱》均未收录，借此机会摘录于下：

[收稿日期] 2000—09—14
[作者简介] 卢经（1956—），男，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副研究馆员；北京100031

谨将遵旨派员履勘俄人在本属乌梁海境内挖金、种地、盖房三事逐款开列，恭呈御览：

查车尔尼克有俄人头目依旺呢固拉什率众挖金，据俄酋声称，系密诺色依郭拉城特人氏。不记年月，奉额尔固斯克依城大臣由本国固色布依万出派费用工人二百名，带领妻子执票前来此处，建盖房屋六十四间，驻挖金沙。九年，又在此处两河岸刨挖金沙一百九十三穴。又有一起俄人七十五名，带领妻子盖房二十四间；又有一起俄人三十五名，带领妻子盖房七间，有澄金水轮三架，已废者三架，借水木槽三段数十里，并将山沟开挖三十余里。查都木达里勒俄人盖驻房二间，浴房一间，牲畜圈一处，木棚三间，刨挖金沙七穴，此内盘镶如井。又开水沟一道，宽一庹，长三十二庹，皆被水壅满。询据该游牧官声称，光绪六年间，来有俄人二十余名，在此刨挖，七年回去。等语。现在无人。

………

查依斯克木阿玛有俄商盖房六间，据俄人巴齐赖即巴胡布声称，系密诺色依城人氏，与工人三名来此贸易八年，回去后盖房数间，十一年在此居驻，原领执照工人带往恰克图。查吉达那河口有俄商盖房九间，据俄人里旺达依声称，系密诺色依城人氏，带领工人五名在此盖房贸易，已驻二十一年矣，六畜蕃滋，形同村落，该俄人持有一年限三体字执照。查阿克河口有俄商盖房六间，据俄人格尔三的、霍尔博布声称，系密诺色依城人氏，带有妻子四人在此盖房贸易四年，持有一年限三体字执照。查吉尔噶噶琥河口有俄商盖房二处九间，此内一处无人，据俄人硕木克声称，系多博勒城人氏，带有妻子七人在此盖房贸易，该俄人持有一年限三体字执照。查吉尔札拉克有俄商盖房十四间，据俄人额伯得呢声称，系密诺色依城人氏，带有妻工人八名，十三年来此盖房贸易，持有一年限三体字执照。查萨斯多克有俄商盖房四间，现在无人。查托勒博勒有俄商盖房八间，据俄人额拉玛声称，系霍洛依城人氏，与俄人绰霍洛米喀固赖均雇给同城雅固尔盖房贸易，细情雅固尔知道。

另查得札纳噶什有俄商盖房一间，据俄人克里布即博布胡布声称，系密诺色依城人氏，与其妹等四人上年秋季来此盖房贸易，持有六个月限三体字执照。另查得哈木萨尔有俄商盖房三间无人，据该游牧官声称，所盖此房每年秋间俄人前来贸易。另查得多尔奇木有俄商盖房五间，据俄人米库赖声称，系霍洛依城人氏，贩卖雅固尔货物，带有妻子盖房居驻，持有一年限三体字执照。

(朱批) 览。[5]

祥麟当日所奏的另外三个文件，即文件(5)(6)(7)，分别为《光朱》第114辑第413号文件、34辑第362号文件、54辑第288号文件。

第477号文件及同日、同具奏人，内容相关文件，据随手登记档摘要如下：

(光绪二十八年) 四月二十五日朱批瑞洵折　四月初四日发[6]：

(1) 折　请与俄使妥商阿拉别克河分界由(朱批) 著外务部妥为商办，片并发。

(2) 片　划分边界情形 (朱批) 览。

(3) 折　妥筹乌梁海游牧安插由 (朱批) 著即亲往履勘，将该处哈民清查，酌度情形妥筹安插，务令各得其所，以顺舆情而重边要，余依议。

(4) 单　两翼大臣原呈 (朱批) 览。

(5) 单　总管头目原呈 (朱批) 览。

(6) 片　请催瑞璋赴任由 (朱批) 瑞璋著即迅速前往。

(7) 片　查办塔什河哈萨克人众由 (朱批) 知道了。

以上摘要中的文件(2)，正是《光朱》误考为"光绪十年四月初四日乌里雅苏台将军杜嘎尔片"[7]的文件。经笔者与相同内容的军机处录副奏折相核对，证明文件(2)为"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科布多参赞大臣瑞洵具奏，二十五奉朱批"。此文件为文件(1)的附片，而文件(1)《光朱》《清季外交史料》均未登载，经笔者多方查找，在本馆军机处录副奏折全宗里找到了原件 (朱批密折)，兹全文抄录于下：

奴才瑞洵跪奏，为阿拉别克河地方俄人要索太甚，并据驻库匡索勒官照会，勒限腾让殊难因，应请敕外务部王大臣与俄使妥商和平办理之法，以弭边衅，密折驰奏，仰祈圣鉴事。

窃查科布多所属阿拉克别克河一带地方，自光绪九年间，经分界大臣升泰、额尔庆额与俄国特派大员勘定界址，议立专约，并会建牌博，定期每三年会查一次。殆光绪二十一年派员会查，俄官忽滋枝节，议令将阿拉克别克河、克色勒乌雍克二处让归俄界，委员百方辩驳，俄官一味狡赖，办理迄未就绪。自是每届会查之年，彼此议论繁滋，各不相让。光绪二十五年，承准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电，饬派员前往速办，比复委员驰商，仍无成说。去年六月，适又届期，奴才以仍仅派员前往虑难办理，宜且亦无明白洋务之人，拟由奴才亲往查看情形，以便设法斡旋，当于去年正月咨商总理衙门王大臣核示，旋承准庆亲王奕劻咨覆，谓科布多会勘界务原关紧要，不容稍有轻忽，惟现在和局尚未大定，仍应按照历届成案派员往查，相机办理。所拟亲往会查之处只可缓至下次再行酌办。等语。

先是已派蒙古处帮办章京钟祥前往该处，与俄官会查牌博，业经起程。奴才遵即照依庆亲王所示密札该章京相机办理。嗣接该章京禀报，并回城面称，俄官与商界牌鄂博现在无事，均不必查，惟阿拉克别克河、克色勒乌雍克地方仍当让归俄界，如能作主，我们当转奏，我国必有奖赏。该章京自不敢允，遂以容报上司为言，亦无办法，各自旋回牌博，并未会查。奴才均将以上各情咨呈外务部查照。本年二月十二日，据玛呢图噶图拉斡卡伦侍卫常升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呈报，本管扎尔布勒达哈萨克等报称，俄官布勒胡布随带俄兵前来中国所属阿拉克别克河地方居住，并将我们哈萨克四十余家人名写去，又说此克色勒乌雍克是我们俄人地方，令于明年四月迁移，如不遵行，带兵讨要。等情。该侍卫闻报当往查看，俄人已经回去，亦未与侍卫来文呈请鉴查。等情。此值春寒，雪尚封坝。奴才接到此报已在二月中旬，当以事关紧要，未知虚实，当复派员绕道驰往查访，现尚未据旋回，乃昨于三月二十六日忽接驻库匡索勒官施什玛拉福照会，直言本俄国阿拉克别克边界地方即不由大清国所属，齐垒哈萨克任意游牧，限于四月二十日将阿拉克别克地方腾出，务须严行办理。并云若是不让，就以兵力催躲。等语。此文系匡索勒由库伦专差送来，十日即到，并附有库伦大臣丰升阿致奴才一函，内述俄领事官声称贵治哈萨克聚众入俄边滋闹，阻之不听，实属顽恶，该国将发兵用武。领事官恐酿成边衅，殊于大局有碍，一面电止俄皇暂缓发兵，一面照请速行设法收回出边滋事匪徒，并求寄函，切恳迅即办理。等语。

奴才查阿拉克别克河地方，自光绪九年议定分界条约后，相安不过十年，俄国即以阿拉克别克河、克色勒乌雍克二处地方应归俄界为词发端图占。自光绪二十一年以迄今，纷纭莫定，前大臣以争让两难，遂存得过且过之心，并不为一了百了之计。用是盖房不问，种地不知，以致俄人得步进步，益肆要求，盖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奴才去年原拟自行前往，托阅边之便，查勘情形，既不果行，而彼今即假托哈萨克越界住牧为词，明目张胆，坚持恶索，即勒限期，复以发兵相吓，并恳丰升阿致书奴才，旁敲侧击，此其迫促挟制之情，诚难理喻。奴才夙夜焦愤，寝馈为之不安。再四思维，该匡索勒文内所云哈萨克住牧一节，自系哈众照常居住在彼，以该地攘为俄属，故喧宾夺主，反以哈众住牧为不应，即所云住牧亦与丰升阿函内所云滋事大有分别。揣其用意，明知科布多兵备空虚，故以势将用武虚声恫喝，盖欲奴才闻之生畏，必且汲汲将哈众挪移他处，腾出阿拉克别克河之中界，彼遂更可全占地利耳。况该处哈众果有出边滋闹情形，该卡伦侍卫常升夙来胆小，事无巨细悉以禀闻，万无不即具报自干重咎之理，此又其诈伪之显而易见者也。然既据照会势出，无可如何，不能不为查办，刻已遴派妥实人员驰往酌度办理。惟该委员止能清理哈萨克事务，至边界事关重大，该委员等万万不应作主。奴才已经谆谕相机商缓，藉支展以便图谋，尚不知能否办到。第北路废弛已久，孤立空虚，毫无可恃，故奴才议筹整顿，至再至三虽已钦奉批旨准行，无如心长力短，人财两空，加以穷塞荒寒，彼固为有可取求，我总以为无足轻重，故一言兵则为两准部咨饬，即裁撤五百之蒙兵；一言饷则为三奉部拨久不协济数万之陈饷。此而惟恃区区血诚以抗强国，仍与敷衍因循何异。其不及之势固不待智者而后知已，《诗经》

有云："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正奴才今日之谓也。奴才于外情稍有所知，于中弊亦非罔觉，自到任后即早见及不能平安无事，宜为毖患之谋，节经渎奏，一无隐饰，早蒙圣慈洞鉴。为今之计，应以内办为主，而外办为辅。盖外办总须万里请命，彼直迫不能容，内办则外务部王大臣与彼公使可以详细榷商，就近秉圣谟，亦不至游移无主，一经钦奉谕旨，奴才自当敬谨奉行，期于迅赴事机无所格碍。惟事体艰钜，关系大局，奴才不敢辄自主张，轻弃寸土，似当特简大员前往查办，就便商定界务，庶可藉以维持较为稳著。至俄人耽视中华，志不在小，尚不止此一二处，日久宕延，不图清理，不惟不能杜其饶舌，且适足以启其贪心。是该处界务若不重新勘定，葛藤一日不断，枝节一日不完。此次俄人用兵占取之说，亦深知科布多底蕴，势力万有不敌，故出此尝试之语。实则该卡伦止设蒙兵十名，俄亦无需发兵，但有数人前来强占，该侍卫即无法可施。奴才去年即已密片陈明矣。总之不让便争，不争便让，实无两全之策。兹若仅责奴才以设法，因应在奴才才力有限，固不敢率意以启争，而情势堪虞，亦殊难空言以御侮。奴才忝膺边寄，不敢诿卸，亦不敢擅专，相应据实奏明，仰恳敕下外务部王大臣速与俄使晤商，属其行文西悉，毕尔总督务当严束边官各守各界，以俟奉到朝廷谕旨和平办理，以期永固邦交。一面仍请谕示机宜，俾有遵循。大局幸甚。奴才幸甚。除已照覆俄匡索勒官暨咨呈军机处、外务部斟酌办理外，谨由驿五百里密折驰奏，伏祈皇太后、皇上圣鉴训示，无任忧愤迫切待命之至。再帮办大臣瑞璋尚未到任，未经列衔，合并声明。谨奏。

光绪二十八年四月初四日

(朱批) 著外务部妥为商办，片并发。[8]

另外笔者发现，文件（3）是《光朱》第115辑第607号文件，而《清季外交史料》卷156中的“科布多办事大臣瑞洵奏乌梁海游牧之哈萨克回出分扰妥筹安插折”[9]，是此文件的副本，内容与该文件完全一致，(4)（5）两文件是607号的附件，《光朱》未收，原件存于本馆军机处录副全宗里，是两件朱批原单(呈)(6)（7）两片在《光朱》相应该收的类项中未被发现。

可以看出，从随手登记档二人同日折片的摘要与军机处录副奏折的对比中，陈维新先生考订的二奏片具奏人是正确的，只是考订的时间为奏片的朱批时间，即奏片送达皇帝后批阅的时间。而造成二奏片误考的原因则是不恰当整理所造成的折、片分家。

二、折、片分家

奏折是清朝高级官员向皇帝报告政务的一种文书（分满、汉、满汉合璧三种)。经皇帝用朱砂红笔批阅后叫“朱批奏折”，未经批阅者称“原折”。一般一事一折，另事再用奏片附上。折开头署名，结尾署日期，奏片既不署名亦不署日期。

1978年4月，在分类立卷整理军机处录副奏折的基础上，为适应社会利用档案的要求，对朱批奏折进行了大规模的整理。第一步，先将奏折按各朝年分开。第二步，各年之内再分内政、交通运输、工程、文教、法律、外交、民族事务、宗教事务、天文地理、反清斗争、列强侵华、综合等十八大类，各类之下，酌情分若干项。第三步，摘由组卷，即逐件摘由，按问题组成案卷。这种整理方法虽然配合了当时利用档案的需要，但朱批奏折“原来的编年体系给拆散了，甚至折片分家，这样就割裂了文件之间的历史联系，为以后档案的科学整理和利用，造成了很大困难”[10]。以文中所述祥麟、瑞洵一日折片为例，一人同日折、单、片分属外交、民族、内政、军务四大类，中俄关系、蒙古族、文书档案、防务四大项（组卷不计)，这就是折片分离的真实写照，朱批奏折无论怎样分，其有具奏人和时间的特点还易查找到，而同日的片、单及附件，人名、日期均无，一旦朱折被分，这些文件的作者、时间就很难确定，《光朱》两奏片误考、误编的根源就在于此。另外，由于整理的质量较差，有些原属宫中朱批全宗的朱批单、片、奏折，在组卷时归到了录副奏折全宗里，而《光朱》又采用“馆藏原档现行管理体系，按十八大类项编排体例”[11]编纂，这些朱批奏折(片、单）就只有被漏编的命运。祥麟所奏文

件（1）（2），瑞洵所奏文件（1）（4）（5），《光朱》就未收录。可以肯定地说《光朱》所收录的并不是本馆馆藏的全部光绪朝朱批奏折，这是编者始料未及的。连同历史原因所造成的宫中朱批奏折有一部分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此部分未按十八大类整理，目前大都以编年体影印出版），要完整地查阅利用，对读者来说是比较困难的。

清代宫中朱批（光绪朝）奏折的影印出版，因整理而造成的编例不统一，《光朱》在编纂过程中又存在一些误编、漏编，使读者利用十分不便，特别是重要文件的误编、漏编，使史料的完整性和可靠性受到影响，降低了史料的利用价值。按专家所言，编纂是档案文献整理的沿续，按照这一思路，编纂的目的就是面对现实，尽其所能，完整真实地反映档案文献的历史联系，这是档案编纂工作科学性原则的基本要求。而在编纂过程中，对所碰到的问题应坚持“多闻阙疑”的原则，对有怀疑的地方加以保留，不妄加校改。在有必要进行校改时，则采取不臆断、不固执、不主观的态度做到考而有据。对清代档案有一定了解的利用者都知道，宫中朱批奏折中的片、单及附件时间是可以利用相关档案加以考订的，这种考订为读者所认可。总之只要以科学的态度和为读者负责的精神，今后此类错误总是可以减少和避免的。

---

①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十五年冬季，259（二）。

②《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437号第577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③《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482号第629页，中华书局1996年版。

④《清季外交史料》（二）第1464页，王彦威纂辑、王亮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⑤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中俄关系7694－45。

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随手登记档，光绪二十八年夏季，310（二）。

⑦《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11辑477号第621页。

⑧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外交·中俄关系7828－32。

⑨《清季外交史料》（三）第2526页。

⑩秦国经《明清档案整理工作六十年》（《明清档案与历史研究》第44页，中华书局1986年版）

⑪《光绪朝朱批奏折》第120辑“编后记”。